



从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 基于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分析

□ 黎相宜

摘要：随着生产性资本主义向消费性资本主义的转化，对于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研究出现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向。本文在借鉴身体理论与劳工研究的基础上，以美国福州移民为个案，探讨这些跨国青年劳工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主体性的建构，以及他们的生产性身体与消费性身体是如何实现历时性转向与共时性呈现的。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的引入刺激了福州农民的身体商品化过程。投入跨国务工行列的他们被各种结构性力量建构成卑微与廉价的生产性身体。同时他们也采取消费策略积极应对加诸于个体之上的限制，试图重塑一个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性身体。然而，跨国青年劳工移民的消费性身体的呈现依然受其收入水平、国民资格、种族身份的制约，其在移居地的有限消费最终也无法显著改变被全球资本与移居地社会所塑造的次等的身体形态。

关键词：跨国青年劳工；福州移民；生产性身体；消费性身体

一、研究缘起

随着消费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确立与形成，消费对于建构自我及社会分层的影响力逐步增强。生产方式不再是阶层差异产生的唯一方式，消费模式同样也可以制造出新的社会区隔，并塑造个体新的身份认同^{[1][2]}。早些年有关生活方式、消费与身份认同主要集中于城市群体与中产阶级^{[3][4][5][6]}，而对于社会底层人群的关注不多。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开始聚焦于中国国内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身份塑造及其主体性的问题，并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从生产领域拓展至消费领域^[7]。

上述研究主要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所形成的阶级、性别、城乡等社会结构因素以及社会转型、消费革命、消费社会等宏观历史背景来探讨对于国内劳工的主体性建构的影响。流动人口与正式的城市居民之

间的划分基本上不是依据种族、肤色、宗教、语言、文化或与占支配地位的族群的亲近程度等这些标记展开的^[8]，其族裔的同质性以及国民资格的一致性使得族群、种族及国族等因素对于其主体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和跨国非正规经济的蓬勃发展，讨论劳工尤其是跨国劳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及其主体性显然无法忽视上述因素的作用。

不同于国内流动人口，跨国劳工在移居地的主体性建构不仅与阶层的向上流动有着密切关系，还意味着其试图去重构与身体密切相关的种族、族群及国民特征的边界。他们不仅希望从生产与消费领域建构一个“看起来身份显贵”的身体，他们还试图维护拥有某种肤色以及族裔或国族特征的身体。从中国流向海外的跨国劳工既是中国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也可视作更大范围内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流入宣称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迁入国在国家利益的旗号下，在国民

和非国民之间划清界限,规定非国民不能分享社会利益,流入其中的跨国劳工的劣势地位也就被合理化了。在这些大规模跨国劳工潮中有为数不少是通过非正规迁移或曰非法迁移进入的^[9]。这些无证移民群体不但在经济收入上受限,面临移居地社会对于少数族裔的排斥,甚至还无法享受基本的公民权利。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这些跨国劳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同时在生产与消费领域来完成其主体性呈现的,为推进劳工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补充。

基于此,本研究将从身体的生产性与消费性的角度切入,基于对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群体(本文的“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移民”包括年龄在16~40岁的移民劳工。之所以要集中在对于青年劳工移民的研究,一是这个群体占整个福州移民的很大比例,二是他们大多来美时间不长、多为劳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更能解释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的转变过程)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于2011年7、8月在福州进行,于2011年12月、2012年1、2月在美国纽约完成。搜集材料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讨论以下几个相关研究问题:作为投身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劳工,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主体性是如何在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得以建构?他们是如何试图将自己被全球资本所贬抑的生产性身体,通过积极的消费策略重新形塑为一个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性身体”的?

二、分析框架:身体的生产性与消费性

随着生产性资本主义向消费性资本主义的转化,身体开始成为消费的对象及消费品,身体的消费性开始凸显出来^[10]。但对于身体研究的转向导致了一种过犹不及的状况:当代的身体研究往往忽略雇佣劳动的主题,注重与文化 and 消费有关的议题^[11]。似乎在消费社会之下,身体天然就具有一种消费性质,人们的主体性通过消费就可以轻易实现各种转化。然而,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现实迫使我们无法忽视生产领域对于主体性建构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处在底层的群体来说,他们的身体虽然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双重性质,但其所体现的生产性是基础^[12]。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将身体的生产性与消费性相互割裂开来,而应重点探讨其中的链接。所谓“消费性身体”是有一个社会过程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性身体”的

基础上形成的。但从“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仿佛身体只剩下消费性的维度了。而生产性身体如何实现向消费性身体的历时转向以及两者如何呈现,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工业社会到来后,人们对于自我身份与地位的感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因为生产领域赋予物理身体以基本的生存条件并使身体成为具有各种社会文化特征与意义的“社会身体”。生产性身体的呈现就成为建构主体身份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个体越来越可能在消费领域中建构其认同,但这种消费性身体的呈现依然与其在生产领域所获得的收入以及认同密不可分。有些群体(如白领)通过消费来巩固与强化其职业与收入所带来的地位,而另一部分群体(如劳工)则通过消费来弥补其在生产中或缺的尊严。因此,当身体在生产领域处于被忽视、被贬抑状态,那么个体很可能采取积极的消费策略来呈现其主体性,这种动机表现在底层群体中尤为明显。此外,消费性身体的呈现程度在不同的消费领域也有着差异。越是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消费领域(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越受制于生产活动的安排。而在娱乐或闲暇等显性消费领域,其消费更有可能去重塑一个与生产领域完全不同的新的身体,对被过度透支的生产性身体形成补偿。

从生产性身体向消费性身体的转向与呈现是个体在各种社会结构制约条件下主观能动的结果。而对于跨国劳工群体来说,这个过程不仅与其本身的肤色、种族、语言、公民身份、国民资格、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经济背景有关,还与其迁出背景(context of exit)与迁入背景(context of reception)等宏观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就试图以流向美国的福州劳工为案例,讨论他们的生产性身体与消费性身体是如何形成并呈现,以及在其主体性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演变。

三、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生产性身体

下面我们将讨论福州青年移民的身体是如何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的,并如何从自目的性转变成换取更好生活机遇的客体。

1. “翻身做移民”:身体的商品化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身体并不具有商品化的性质。虽然“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逐步确立。但中国农民的身体并未成为贬抑的对象,反而其“土里土气”的身体形象是符合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



五六十年前,“翻身”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曾经深入人心,它确立了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参与者的主体地位^[13]。加之当时国家严格管控移民的移入与移出,以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官方宣传,当时没有更多海外资源的福州农民很少萌生“出国”的想法。

真正使这批农民意识到身体可以变成商品换取更好生活机遇的契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有一批来自福州及其邻近郊区的海员早在“二战”后的20年间“跳船”(“跳船”指船舶到达美国后船员登岸,先非法滞留美国,而后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绿卡)留居美国^[14]。1974年中美恢复正常邦交后,这些海员的亲属陆续以家庭团聚理由移民美国。改革开放后,这批“跳船者”及其家属顶着“海外华侨”的光环陆续回乡探访,他们在家乡的一系列炫耀性消费实践使得一直深信“翻身做主人”的福州农民受到不少冲击。随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因素的逐渐恢复和引入使得中国农村内部开始发生分化。由于社会转型带来大量的机遇和机会加上海外“发财致富”的消息,使乡亲们开始产生了“相对失落感”(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15]。人们对于生活意义与幸福的理解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其提高消费水平的相对成就,比如能够盖一栋漂亮的别墅式的祖屋,买得起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等。

但低水平的农业耕作根本无法满足福州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期待。从这个时候开始,福州人意识到要靠自己达到在经济上“翻身”——改变其主体性,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其可用的资源是已然存在的移民链及其廉价的物理身体。侨乡的人们开始频频议论关于“美国好赚钱”的传闻,以及“某人出国没几年就发了大财、当上侨领”等“侨乡故事”,这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于富裕生活的衡量标准,使福州人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接受现状、也不轻易接受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差距的现状的心理。甚至有些家境还过得去的移民为了心目中更好的生活而打算依靠身体来换取更好的生活机遇。80年代到美的李立明在移民前有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小生意,但想到一个月可以挣七八千元人民币,他还是下决心到美国闯荡:“我干个几年,积累个二十几万人民币回去做个小生意,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移居地的工资高使福州人产生了排除万难、历尽艰辛都要到美国打工的强烈愿望。他们未尝不知道在

美打工的艰辛,但家乡工作与发财机会的贫乏依然刺激着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试图将自己身体作为商品“推销”到发达国家以换取到更好的“价值”。尽管目前侨乡本地经济因为有了侨资的注入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美国依旧是许多福州年轻人的梦想。2008年,年仅22岁的王晓华在国内已经小有事业,但从小就有着美国梦的他仍然选择负债8万美金偷渡来美。这种美国梦当然是有其坚实的物质背景,因为“美国能够提前享受也许在家乡几十年后才能享受的生活”。

而将身体商品化并卖出高价值的前辈们的成功经验也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投入跨国务工的行列中。这些年轻的“身体”试图通过积极地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从而给自己与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机遇。

2. 偷渡:被改装与污名化的身体

相比其他传统侨乡的移民以及进城打工的务工者来说,福州劳工移民想要将自己廉价的物理身体贩卖至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物流、信息、技术已经全球化,但国家常以主权和安全为由,拒绝一些“不受欢迎的身体”进入管辖范围。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其移民政策上显然更欢迎拥有英语语言资本、来自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投资及技术移民。而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不具备专业技能及语言优势的中国乡下农民的身体显然不在美国的首选之列。那么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体以满足备选资格进入“梦想之国”呢?其中,偷渡与非法滞留是福州劳工移民改装自身身份以及主体性比较常用的方式之一。

尽管福州劳工移民以偷渡被人们所熟知,但在20世纪80年代,偷渡并不是福州人首选的方式。当时有很多人是以前旅游或探亲签证的名义直接坐飞机从福州或香港或第三国飞往美国。这种方式无论是出境还是入境都是合法的。只是这批人到美后通过各种方式滞留,也即“黑”下来。张隆军当时通过旅游签证的方式途经南美洲入境美国,花了9天时间就平安到美。他的入境是合法的,整个旅途也相对安全。当然,也有些移民没那么幸运,有不少人长期滞留在第三国,以等待合适的时机进入,有些受访者表示可能等待时间需要几个月之长。但总的来说,80年代早期的移民出境是相对安全与自由的。来到美国后,很多移民通过政治庇护等方式较容易拿到身份。这种进入全球生产领域的相对便利性进一步诱发了80年代末的大规模移民潮。而随着美国对于边境管控的加强,不少

试图采取“合法入境、非法滞留”方式的福州劳工移民难以如愿,只能改由风险性极高的偷渡方式“进军”美国。

福州人的偷渡形式比较多样。第一种是非法出境,以20世纪90年代为盛。据许多福州人回忆,当时有大批的渔船停靠在闽江口沿岸,等候着源源而来的偷渡者直接坐渔船离开福州。这些渔船开到公海地段就等待美国的船来接。运送偷渡客的人被称之为“蛇头”,而偷渡客则被称之为“人蛇”。有很多“小蛇头”与“人蛇”是同村人甚至有着血缘关系,而“大蛇头”一般不轻易露面,其中有不少是台湾人。一旦“偷渡”败露,往往抓到的都是“小蛇头”。最为著名的就是1993年震惊世界的“金色冒险号”事件,当时船上载有260多名偷渡客,大部分的乘客是福州人。由于这种偷渡方式极其危险,我在福州时常听闻一些偷渡客至今下落不明。第二种偷渡的方式是以貌似“合法”的途径出境。一般来说,采用这种方式的人之前有被遣返经历、有案底,因而采用“翻人头”的方式,即将自己的照片覆盖在一本真的护照上面。这种方式很容易在出境时被查出。第三种是采取合法签证到他国的方式,先飞往其他国家,再由其他国家或陆路或水路或空路的方式非法入境美国,非法滞留下来。尽管是合法出境,但为了躲避所经国移民局的检查,需辗转多国,跋山涉水,旅程往往格外艰辛曲折。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渔船偷渡到现在翻山越岭地从他国入境,偷渡的方式已经更为多元化,但偷渡并没有因此而更安全和更有保障,依旧充满着艰辛和危险。偷渡时年仅22岁的王晓华提及偷渡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我当时是从福州到深圳,然后到香港,从香港坐飞机到俄罗斯莫斯科,再坐飞机到古巴,我在古巴就待了两个月的时间,接着再从古巴到墨西哥,我们从墨西哥爬山过去的,是在德州的边境,我们当时爬了一天一夜才到的那边。我们是选择晚上爬山过去的,不容易被发现。我们的上面就是拿着枪的巡警,被发现就完蛋了,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不敢到处看……现在回想起还是有些后怕,我能够来到美国,都是九死一生的。

王晓华在叙述上段话时声音低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显然不愿意过多回忆这段惊险历程。然而,偷渡对于福州人来说是物理身体能够踏上美国的重要的第一步。为此,他们甘愿做出任何牺牲。

3. “黑着”:自我压榨与内部剥削之下的身体

福州劳工移民想尽办法改变身份、包装不受欢迎的身体,以达到最终进入美国的目的。被中美视为非法移民的他们不具备任一国家的公民资格,其身体是不受民族国家认可的。在这种状况下,既具有内向保护特征但又与美国大都市经济接轨的聚居区族裔经济(enclave economy)为福州劳工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

早期以“跳船”者为主的福州人几乎全分布在纽约唐人街及周边的餐馆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福州餐馆开始以几何级数遍布美国东部,甚至拓展至华人不多的纽约附近州的郊区或山区里。福州的外卖餐馆之所以迅速发展起来依赖于不断涌入的劳动力。餐馆成为新来者的容身之地,新来者不但马上可以工作赚钱,而且餐馆一般能提供免费食宿,使他们能较快还清出国费用并有所积蓄,进一步申请或通过借贷方式帮助国内亲友来美。外卖餐馆的工作分为打杂、炒锅(厨房工种之一)、外送等,只有年富力强、吃苦耐劳的身体才能够受到资本的青睐而允许准入。

王晓华刚到纽约时在一位朋友餐馆里打杂。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一年后王晓华开始做炒锅。炒锅的工资虽然相对比较高,但是整个外卖餐馆的枢纽,技术与速度都要求比较高。王晓华每天从早上10点干到晚上10点,一个月只有一天的假期。外卖餐馆二楼就是员工宿舍——20平米的房间,有8个人合住。随着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体力工作,一年后,王晓华发现自己的脊椎发炎,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王晓华来美时正值体力最盛之时。一个年轻健康的男性劳动力在外卖餐馆干上不到两年,身体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由此可见外卖餐馆的劳动时间之长与强度之大。但对于那些大字不识、迁移前以务农为业的福州劳工来说,廉价的身体沦为实现“美国梦”的手段。他们唯有依靠压榨自己的身体并将其“规训”成符合资本要求的“劳动机器”^[16],来获取在移居地的生存空间。在繁重而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这批前农民逐渐转变成现代世界生产政体中的工人。

福州劳工移民除了自我压榨外,更重要的是,在移民内部存在着严苛的内部剥削。福州人以从事餐馆、制衣、运输等低技能工作为多,但也有不少福州人投入其他服务业。在这些无福利保障、低薪水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中,同族裔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偷渡潮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证移民涌入,许多移民只能依靠不断地自我压榨



与族裔内部剥削等内卷化方式来获得身体在全球资本生产体系下的价值兑现。很多福州人不惜压低成本降低价格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种恶性竞争不仅导致整个行业利润的急剧下降,这种激烈的内部竞争也导致雇主对劳工的盘剥程度日益加强。据林兵回忆,90年代福州餐馆劳工的月工资曾从一千二三美元降低至七八百美元。尽管如此,这批低技能而又没有合法地位的移民不得不继续依赖同样来自福州、已经成为老板的移民。这些企业主甚至为家乡人做担保或提供旅行费让其来美并成为其廉价的劳动力,以偿还欠下的债务及人情。李先生曾在福州人开的餐馆中工作。他在描述福州餐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时是这么说的:

福州人自己开了店当老板,下面又招了福州人,他们这些福州人更惨,简直是人间地狱来的,他们这样的人当老板了之后,只会对那些工人更差,他们反正都不当自己是人,就是跟猪狗一样,你还当他是人吗?你切菜切慢点,老板就炒你鱿鱼了,他就想着切快点,干什么都要很快的。他们基本上就把你关在一个地方住,你起来就要去工作,就跟监狱一样。

福州外卖餐馆的主要劳动力来自家中的青壮年劳动力,顶多再聘请若干名工人,这些劳工也大多数与雇主是亲属或朋友关系。这种自我压榨与剥削家庭内部成员的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可以交换到家人日以继夜的劳动及不计回报的付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运营成本。亲属的“跨国道义经济”促进了移民的集体性流动及社会资本的积累^[17]。外卖餐馆通过家庭劳作的方式既让家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也使家庭关系与家人的生计被卷入到这种自我生产政体中并面临更大的风险。2004年,李立明在俄亥俄州开了一家自助餐馆。为了降低聘请工人的成本,李立明的太太放弃制衣厂的工作,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辍学成为家里的劳动力。怎奈李立明运气不好,餐馆运营不当,8个月后停业,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太太要重新找工作,而辍学的孩子也难以回校读书。外卖餐馆是福州人实现美国梦的重要阶梯,但往往是以牺牲第二代的教育及发展为代价的,这种生产体制剥夺了移民第二代向上流动的机会,导致了底层的再生产。

无证移民认可这种自我压榨与内部剥削的方式作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他们难以以某种积极的态度将自己认同为工人阶级的成员,而是想尽快摆脱受鄙视的地位。他们在“脱嵌”状态下的“非人生活”都是为了重新嵌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们相信如

果能“吃得苦中苦”,终将有一日自己能够重构主体性——成为“老板”,像雇主那样去剥削其他更新来的移民。有学者指出,劳工阶级都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自己当老板,从事小生意是提供劳工认识往上层阶级移动的一个主要方式^{[18][19]}。这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了雇工对于老板及生产体制的反抗,还强化了雇工之间的竞争个体主义^[20]。在福州劳工移民看来,“老板梦”何时实现取决于其身体卷入族裔经济生产模式的程度。这种想法既加剧了雇工之间的身体竞争,也使资本可以利用个体竞争从中轻易地挑选出更年轻、廉价,更有活力及更“听话”的身体,比如雇工会以不断提高工作效率、额外加班等方式吸引老板的继续雇佣、加薪与升职,而不是去反抗这种生产体制。

在严苛的“黑着”的美国生活中,福州劳工移民通过自我压榨以及同族裔、同地域甚至是同家庭的内部剥削等内卷化的方式,来满足全球资本对于廉价劳动力的期待和要求。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福州劳工移民被建构成为廉价、卑微与次等的生产性身体,其物理身体只是主体实现“美国梦”的工具,必然是不受重视以及被贬抑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试图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寻找自身的主体性、身份认同与意义感。他们希望通过在消费领域再造一个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性身体”。

四、消费性身体的呈现

资本不仅需要在生产领域寻求廉价劳动力,同时也需要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为生产扩张提供可持续的动力^[21],这为跨国劳工消费性身体的形成与呈现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劳工移民来说,进入美国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后,其消费欲望一方面在大众媒体、广告、时尚等介质的鼓动下被无限扩大,消费也似乎提供了机会让他们重塑在生产领域被贬斥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低收入状况又对其实际购买与消费能力形成限制。下文将探讨福州青年劳工移民作为种族、阶层、身份等多重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在移居地的消费会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以及他们如何理解和应对这种困境的。

1. 受制的消费性身体

一日三餐是个体最为日常与必需的消费。然而这

部分满足基本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却是深深地嵌入生产领域中的。生产的性质与工序能改变一个人身体饥饿与否的节奏,也规训他的阶层界限、挑动他的“上进”期望^[22]。

餐馆是一个高速运转的生产领域,从打杂、下单、炒锅以及外送都需要快速而无误,这不仅对于员工的身体是很大的透支,也进一步形塑了员工进餐的时间与质量。由于餐馆最忙碌的时间都是在中午和晚上的就餐时间,所以从事餐馆业的移民,无论是老板还是劳工都会避开日常就餐的高峰期:早餐通常是在第一个高峰期(早上11点到下午两点)之前吃完,这仅限于餐馆老板。大部分的员工要准备食材、清扫厨房、布置餐馆,并没有时间吃早餐。而午饭则是在下午的三点左右开始。通常来说午饭的菜并不多,以能够大量补充体能而又廉价的米饭为主,饭菜均来自厨房遗留的食材。第二个高峰期是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因此,晚饭的时间在10点左右。当然,这种就餐时间的安排并不仅限于工人。很多老板即使可以自主选择就餐时间,他们的就餐时间表依然与劳工的进餐时间一致。他们表示中午12点及下午6点的时间,他们肚子并不饿。这种工具性惯习是个体由于其社会经历与所处位置而形成的(许多老板也是从劳工干起),福州青年劳工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揭示了长年从事餐饮工作的惯习所遗留在身体上的痕迹。此外,这也是为了表示与工人同甘共苦、共同进退的象征性身体实践。

福州青年劳工的日常餐饮惯习显然是嵌入在高度组织化及效率化的生产实践中的。所谓追求美味的食物、健康的饮食习惯、良好的就餐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一种奢侈的想象。这种长时间不定点就餐的直接后果是大部分从事过餐饮业的移民都患有胃病。身体“成为一台机器,却无法忍受机器能忍受的程度”^[23]。由于身体需要每天承受超负荷的劳动,许多福州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非常差,导致这个群体经常面临一项不愿意支付但又无法绕开的消费——看病。

林修祥在来美前是福州市一家中医院的老中医,他来美后在东百老汇街上开了一家诊所。据他的介绍,除了胃病之外,肺病、心脏病及癌症也是劳工移民常见病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时间在工作条件极差的厨房工作,吸入油烟过多导致的。超负荷的厨房工作也使得不少移民腰椎、颈椎及肩膀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些遗留在劳工身上的病痛铭刻下其所处的

政治经济关系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潘毅所说的个体抵抗日常经验的次文本^[24],只不过潘毅笔下的女工所反抗的是“世界血汗工厂”,而这些青年劳工身体上的病痛意欲表达的却是对这种在少数族裔聚居区所形成的家庭作坊式生产的无奈。

雪上加霜的是,无证移民不在美国医疗保障体系之内。许多移民即使身体不舒服也不敢上社区医院看。一方面是由于语言不通,另一方面是无法负担昂贵的医疗费用。移民往往会吃些民间中草药或到福州移民开设的小诊所就医。在纽约唐人街东百老汇大街(福州移民的主要聚居区之一),随处可见大批药方及中医。中医的费用比去正规社区医院要便宜得多。唐人街的很多中医并不具有美国所认可的西医执照。当然,这些“非法行医”的人大部分在中国国内有过行医经验,比如林修祥。由于中草药便宜,就诊费用低廉,每次看病的费用在十几美元,对于经济不宽裕且病情不严重的移民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也有一些江湖骗子,为了迎合移民想尽快治愈但又无力花更多钱的需求,他们往往会给前来就诊的患者开一些无益于康复的“药丸”。有不少移民由于得不到及时与有效的治疗,小病被延误成大病,拖着被过度压榨和剥削的身体回乡,没过多久便在乡下去世。甚至有些移民由于无力医治“千疮百孔”的身体而选择直接放弃生命。

而很多福州的女性移民的身体健康状况甚至比男性更糟糕。福州的女性移民除了与男性同样承受沉重的劳动压力,还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满足家人对于维持生存、身体关爱的基本身体需要,为家庭经济共同体的持续与发展操劳。长此以往,不少女性移民患有妇科疾病甚至是癌症。为了给家庭尽量节省医疗成本,“忍”是不少女性患病后的首要选择。因此,相异于普通人群中女性寿命较长,福州移民有不少是妻子先于丈夫去世的,女性移民所承受的重压可想而知。

无论是作为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餐饮消费,还是弥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出现身体受损的医疗消费都是让位于生产领域的,不但无法重塑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主体性,反而给他们留下无法超越其种族与阶层地位的无奈。

2. 放纵的消费性身体

对于福州青年劳工移民来说,满足基本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领域是受制于生产领域的。但当具备一定



的时间以及经济能力,他们还是试图去关照与善待长期被忽略与被边缘化的身体,使身体在某些消费领域与空间中得到释放与犒赏。

有为数不少的劳工是成年的“单身”男性(尤其是80年代与90年代早期来美的移民),即使已成家,很多是只身来到美国。在没拿到绿卡取得正式身份之前,他们都无法回乡探望家人或申请家人来美,这不但造成家庭成员天各一方,还导致移民的性需求长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有些男性通过找“情人”同居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情人”在国内也大多有家眷。在这种被他们自己戏称为“革命夫妻”的临时组合中,男性移民通常需要支付租房费,偶尔给“情人”买点礼物,而女性则能够节省不少生活支出以寄回家。不过福州青年劳工想找“情人”也并非这么容易,尤其是不少来自广东与东北的移民认为他们素质差,往往避之不及:“有些福佬色眯眯的,很不正经,好像几百年都没见过女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找“小姐”就变成一种既能满足需求又不伤自尊的方式。据一个关键报道人王立彰告诉我:“福州人不少夫妻不在一起,很多人去找‘小姐’,很容易染病,性病啊什么的都有的。”我在福州移民聚居的纽约东百老汇大街上就发现许多治疗性病的广告。由此也可从侧面判断出嫖妓的福州人不在少数。嫖妓除了满足身体上的需求,还以消费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掌控别人的身体。一些比较要好的劳工移民私下向我表示:“找‘小姐’会让他们感觉很好,好像可以去随便支使别人了。只要花点钱就行。”客人花费了金钱,就可以随意使用服务,当然包括“小姐”的身体。“小姐们”并不在乎客人的出身和职业(哪怕她们心里会觉得这些劳工移民还不如自己赚得多),在表面上来说,“小姐们”面对顾客时是顺从与卑微的,他们会不断地调整和提高自己的身体技术,以期获得更多的小费。“小姐”(福州移民能消费起的“小姐”大多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不过来自福州的并不多。照理说背负巨额债务的福州女性移民更有可能进入较为轻松、收入高的色情服务行业,但福州女性大多会通过婚姻或是找“男朋友”的方式,但真正做“小姐”的并不多。有福州移民解释可能是因为福州人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移民,如果从事色情行业很容易传到家乡致使身败名裂,也让家人抬不起头)显然在整个生产链条中是最为低微的主体,尽管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的身体也被全球资本视作次等和卑微的,但是他们面

对“小姐”会有一种天然的自豪感:“我靠的是我的体力,并没有去出卖我的灵魂。”这种地位上的优越感给予他们很大的自尊上的满足。“小姐”消费是劳工移民获得感官刺激、寻求主体存在位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如果说性消费大部分是男性的专利,那么赌博则是无论男女都热衷的一种娱乐消费。在纽约唐人街的孔子大厦门口,每天都有接载乘客到纽约周边郊区(大多分布在康涅狄格州)赌场的巴士。前往赌场需3至4小时的车程,车费仅需15美元,另外还附赠45美元的泥码(筹码的一种,不能直接兑换成现金的,需要客人在赌台上投注)及15美元餐券,希望以此鼓励和吸引更多的移民去赌场。这些赌场内大多装修得美轮美奂、富丽堂皇,有住宿及吃饭的地方。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工移民从不被移居地视为一个理想的消费公民(consumer-citizen),然而他们通过赌场消费,可以难得体验到“美好的”资本主义世界。许多福州移民由于经常来赌博,因而获得免费吃住的待遇。福州移民最喜欢玩的是“牌九”,只要是在“牌九”区域的顾客十有八九是福州移民。

对此,我十分困惑地问过不少移民,为什么要将辛苦挣来的钱在赌场白白地花掉呢?不少移民表示:“因为挣钱的过程实在是太辛苦了,如果不释放一下,实在无法面对这么现实的生活。”在赌场这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虚拟空间中,货币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即使一个在赌场外不受尊重的生产者,也能通过赌场消费不断协商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及身份认同。个体在这种为数不多能够得到平等对待、体会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生活、充裕物质的空间里,美国福州青年劳工似乎获得了主体性的转换:他们不再是人人喊打、犹如过街老鼠的非法移民,而是大方体面、可以对赌场服务生呼来喝去、得意地享受他人身体服务的“有钱老板”。那个在生产领域被贬斥和压抑的身体通过赌场消费得到了释放,消费者也似乎由此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赌场使得移民们可以暂时摆脱原本的社会角色,产生在社会规范系统之外的关系平等与融合的体验(communitas)^[25]。

但这种看似主体性的转换却是暂时的,而隐藏在背后的是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因为一出赌场,这些青年劳工们马上面临着更为残酷的打击。在赌场赢钱并非不可能,但保持“常胜将军”的几率是少之又少的。长时间以及频繁地前往赌场消费,所带来的是消费者



经济能力的急剧下降及更没有尊严的生活。

在严苛的“黑着”的美国生活中，福州青年劳工移民试图超越生产领域对于身体的束缚。虽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餐饮与医疗消费上，劳工移民的身体仍然是受限与扭曲的，但他们以消费者的形象出现在赌场娱乐与性消费的空间中，试图通过自己努力积累的财富来实现在主体性的转换。但他们这种发泄性身体消费方式在他者看来似乎重新将身体污名化，似乎也无助于跨国劳工更大范围内获得价值或尊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以往有关劳工主体性以及身体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聚焦于一个数量庞大、投身于海外劳动力市场的特殊跨国劳工群体——美国福州青年移民。我们基于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了 this 群体是如何在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构建其主体性，以及其如何采用消费策略来重塑在生产领域受到贬斥的身体，并实现消费性身体的呈现的。实际上，“劳工”的身体经历了从压抑到释放的过程，这不仅是一个历时性的转向，也是一个共时性的过程。生产性与消费性是劳工个体身上的不同面向，是同时呈现而不是分裂的。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因素的逐渐恢复和引入使得中国的社会阶层开始发生新的分化。在福州农村，早期“跳船”者及其亲属回乡后的一系列炫耀性消费实践使得沉浸在“翻身”话语之下的福州农民受到冲击，使其对于幸福的理解越来越多地体现为高水平的消费上。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消费欲望恰好与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不谋而合。福州人开始意识到要换取更好的生活机遇，需要依赖已然存在的移民链，将自己的身体商品化贩卖给全球劳动力市场，成为跨国劳工。

对于迁入国来说，跨国劳工弥补了这些国家在某些低端服务业与临时雇佣行业劳动力缺乏的状况。迁入国的本国工人历经工业化，已经被规训养成“有节制地付出能量”，这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些身体所适合从事的劳动^[26]。比如有些“4D”工作（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 Demeaning）不再适合于本地人，而来自国外的劳工就自然成为理想对象。这些跨国劳工不仅提供了易于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他们的身体尚未受制于严格调控、稳定持续的例

行常规，可以最大程度上满足资本对于身体的控制需求。

虽然美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为价格低廉的跨国劳动力提供某种生存空间，但福州农民想要变成跨国劳工，还得通过改装身份、以非正式的方式进入美国。他们通过自我压榨以及同族裔、同地域甚至是同家庭的内部剥削等内卷化的方式，以偿还高额的债务并换取在移居地的生存条件。这些跨国劳工所从事的非正规族裔经济对于美国的经济甚至是全球资本的利润创造贡献巨大。然而他们的身体却被自己、市场以及移居国共同建构成为低微、廉价与次等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跨国劳工试图去积极应对结构性的限制，通过消费重塑自身的主体性，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与意义感，重新呈现一个受到资本尊重、能够享受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价值的“消费性身体”。但劳工在满足基本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上首先受到了来自生产领域的强有力的制约。而在一些能够给劳工带来美好体验的娱乐消费上，其主体性的转换也是不完全的。消费性身体是一种周期性在消费领域的自我放纵或自我犒劳，它是对生产性身体被透支的一种消费补偿机制。他们确实可以在某个消费阈限内（如赌场或娱乐场所）尽情展示其被释放的身体。但与午夜钟响后的灰姑娘重回厨房一样，这种补偿机制让他们在生产领域陷入强度更大的自我压榨与族裔内部剥削，以偿还赌债或其他仪式性奢侈消费。

这种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的历时性转向与共时性呈现不仅是跨国劳工能动性的结果，还受到移居国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约束。在移居国，主流核心族群由于拥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并占有文化、社会以及政治资本，相比来自不同国别、种族以及阶层的跨国劳工，更可能进入一些优势的职场场域或社会场域，更愿意也更有能力生产出具有最高价值的身体形式以及将其身体和生活方式界定为高人一等的。而跨国劳工所与生俱来的族裔特征（如肤色、体质等）与后天的社会特征（所属国籍、阶层等）直接影响了其身体的价值以及个体在移居地生产具有符号价值的身体形式的能力。种族主义的效应使其资本积累过程比核心群体更为艰难。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跨国劳工的消费性身体仍然受到其收入水平、经济地位、种族身份的限制，其有限消费带来的变化最终也无法显著改变



他们在生产领域被全球资本、移居地社会赋予的次等的身体形态。

在本文的案例中,消费在形塑主体性、改变身份认同的作用是受到全球生产体系与移居地社会结构的严格限制的。跨国劳工似乎只有通过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两栖消费,将在移居地无法完成的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转移到祖籍地完成才能完成主体性的转变^[27]。即使如此,这种主体性的转变也是暂时性、季节性的,同样也不能完全改善他们在整个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领域以及移居国社会的劣势地位。当然,这已不是本文所主要探讨的内容。■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比较视角下的移民安置聚集区治理模式及其绩效研究”(16CSH01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特别委托项目“广州新移民与侨乡社会的互动”(项目批准号:GD14TW01-12)的阶段性成果]

黎相宜: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博士
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169-175.
- [2] 王宁. 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 社会学研究, 2001(1): 4-14.
- [3] 姚建平. 消费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4] 赵卫华. 地位与消费——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状况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5] 郑红城. 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6] 陈昕. 救赎与消费[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7] 余晓敏, 潘毅.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再造性[J]. 社会学研究, 2008(3): 143-171.
- [8] [美] 苏黛瑞.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 王春光, 单丽卿,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 [9] [15] 李明欢. “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 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J]. 社会学研究, 1999(5): 83-93.
- [10] 冯珠娣, 汪民安. 日常生活、身体、政治[J]. 社会学研究, 2004(1): 107-113.
- [11] 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1.
- [12] Pun, Ngai.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3(4): 469-492.
- [13] 宋平. 中国新移民与跨国小社会实践[C]. 罗勇, 徐杰舜主编. 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人类学高级论坛2011卷[M]. 黑龙江: 黑龙江出版社, 2011.
- [14] Marlowe Hood. “Introduction.” In *Sourcing the Problem: Why Fuzhou?* [C]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M].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1997.
- [1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27.
- [17] Leah Schmalzbauer. Searching for Wages and Mothering from Afar: The Case of Hondur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4(5): 1317-1331.
- [18] 陈祥水. 纽约皇后区: 新华侨的社会结构[M]. 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1: 267-268.
- [19] Kwong, Peter. *The New Chinatown* [M]. New York: Hill & Wang, 1987.
- [20] 迈克尔·布若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10.
- [21] 汪建华. 实用主义团结——基于珠三角新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3(1): 206-227.
- [22] 马杰伟. 酒吧工厂: 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40.
- [23] Peter E. S.Freund. *The Civilized Body: Social Domination, Control and Health* [M].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1.
- [24] 潘毅.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J]. 社会学研究, 1999(5): 11-22.
- [25] Victor Turner. *Rituals and Communitas* [J]. *Creative Resistance*, 2005(26).
- [26]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 Harmondsworth: Penquin, 1980: 437.
- [27] 黎相宜, 周敏. 跨国空间下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基于美国福州移民两栖消费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4(2): 43-64.